

南诏年号问题补证

方 冬

(云南大学 历史与档案学院, 云南 昆明 650091)

摘要: 南诏年号问题是南诏史研究的热点, 对隆舜“贞明”年号进行重新考证, 知其即位当年即改元, 贞明元年是 877 年。同时, 南诏从“长寿”直到“天启”间的十个年号在唐宋中原典籍中皆失载, 是南诏自建年号一事长期不为唐知, 背唐建元的结果。贞元会盟后, 南诏上表奉唐, 受用唐历。在与唐交往中使用唐朝年号纪年, 而对内则使用自建年号纪年。背唐建元恰好表明南诏奉唐的属国性质, 也隐约体现出南诏统治者对外奉唐, 对内则自统一方的矛盾心态。

关键词: 南诏史; 南诏石刻; 唐朝; 贞明年号; 考证

中图分类号: K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5639 (2020) 04-0089-06

DOI: 10.14091/j.cnki.kmxyxb.2020.04.016

Supplementary Demonstration on the Reign Title of Nanzhao Kingdom

FANG Dong

(School of History and Archives,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China 650091)

Abstract: The reign title of Nanzhao kingdom is the research focus for its history, and the renew textual research for the reign title of Zhenming in the period of Longshun Emperor shows that the emperor gained his crown in 877. At the same time, the loss of record for the title from Changshou to Tianqi is found in the documents of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and is the result that the government of the Nanzhao Kingdom promulgated its governing title without the permission from Tang government. After the alliance with the Tang Dynasty in 794, Nanzhao government began to use Tang calendar in its contacts with the Tang government. Its shows the nature of an affiliated kingdom and the conflicted attitude which is the foreign policy of affiliation to Tang government and domestic policy of unity to its own people.

Key words: history of Nanzhao Kingdom; stone inscription of Nanzhao Kingdom; Tang Dynasty; the title of the Emperor Zhu Youzhen; textual criticism

对于南诏世系、年号和族属的研究, 是 20 世纪南诏史研究的热点。结合文献和考古资料, 前辈学者李家瑞、张增祺等都曾作出精深论述。^①应该说, 在既有资料已被充分挖掘的情况下, 对于南诏年号的考证已趋于饱和。然而回顾既往研究, 一些细节方面仍缺乏必要论述。本文拟就南诏“贞明”年号进行重新考证, 同时探讨南诏年号从“长寿”

到“天启”在唐宋中原典籍中的蹊跷史载, 以兹补充。不周不确之处, 还望师友批评指正。

一、南诏的历法系统

回顾以往南诏年号考证的基本方法, 主要是通过考古文物中的时历信息和文献记载相参照, 再将

收稿日期: 2019-09-17

作者简介: 方冬 (1995—), 男, 云南曲靖人, 硕士研究生在读, 主要从事历史人文地理研究。

①有关南诏年号的研究, 张增祺先生着力颇多。见张增祺:《关于南诏、大理国纪年资料的订正》(刊载于《考古》, 1983 年 1 月); 张增祺:《〈中兴图传〉文字卷所见南诏纪年考》(刊载于《思想战线》, 1984 年 4 月)。张先生依次对保和天启等年号进行了订正。此外, 相关研究还有: 李家瑞的《用文物补正南诏及大理国的纪年》(刊载于《历史研究》, 1958 年 7 月)、梁银的《云南发现的南诏纪年文物及其相关问题研究》(刊载于《大理民族文化研究论丛》, 2012 年 7 月)。在订正南诏年号时, 正是由于文物资料中大量使用汉历干支法, 才得以和唐历对校。

其订正的年号与中原汉历干支纪年相对。

对于南诏的历法使用情况。依《通典》所记,南诏未立之前的松外诸蛮,“颇解阴阳历数……以十二月为岁首,”^[1]说明当地有自己的历法体系。《资治通鉴》载:“梁建方击松外诸蛮,破之……自云本皆华人,其所异者以十二月为岁首。”^[2]也提到洱海诸蛮使用以“十二月”为岁首的历法。从历法角度看,以十二月为岁首是建丑,而唐历是建寅,以正月为岁首,二者不同。但根据《蛮书》和《新唐书》的记载来看,南诏应是在与唐交往中,逐渐吸收了中原的历法体系。《蛮书》载:“改年即用建寅之月,其余节日,粗与汉同,唯不知有清明寒食耳。”^[3]《新唐书·南蛮传》也说:“俗以寅为正,四时大抵与中国小差。”^[4]因此,伴随着交往增多,南诏已经普遍使用和唐历一样以寅为正的历法了。

此外南诏与唐朝的文化交流十分频繁,曾一度派遣贵族子弟去成都研习汉化。中原历法在南诏传播甚广,史载:“剑南两(西)川及淮南道,皆以版印历日鬻于市,每岁司天台未奏下新历,其印历已满天下,有乖敬授之道。”^[5]因此中原的历法体系,尤其是干支计时法,在南诏影响深广。

现存的南诏石刻上含有大量的时历信息,其年号使用南诏自建年号,而具体计时方式则用干支法。如大理崇圣寺梵钟铭文载:“维建极十二年岁次辛卯三月丁未朔二十四日庚午铸。”^[6]建极为世隆年号,建极十二年为唐咸通十二年(871年),该年正是汉历的辛卯年。

以上分析可知,南诏未立之前应有自己的历法系统。但在与唐交往中,其历法体系逐渐受到影响。同时,汉历干支法使用已经十分普遍。由此,今人才得以用干支相对考订南诏年号。

二、“贞明”年号新考

尽管南诏年号大部分均已订正,但至今为止,有关隆舜的年号问题,依旧处于存疑状态。

对于隆舜年号,诸说不一。《新唐书》和《资治通鉴》所记相同,有贞明、承智、大同三个,《纪古滇说集》和《滇云历年传》只记贞明一个,《南诏野史》和《滇载记》记有贞明、嵯耶两个。而《滇史》记载:“改元贞明、承智、大同,自号大封人……唐昭宗大顺元年庚戌,隆舜改元嵯耶。”^[7]记载四个,且明确记载嵯耶元年是昭宗大顺元年(890年)。“嵯耶”起止年为889—897年,共九年,《滇史》所载与真实情况只差一年,当有所据。

“贞明”是世隆的第一个年号,“贞明”之前的年号,“建极”最后一年是877年。值得注意的是,南诏有新君继立当年即改元的做法。^①因此,如果世隆继位当年就改元,则贞明元年是877年,如果是次年改元,则贞明元年是878年。

梁晓强先生认为《夔古通纪》一书中有“贞明九年乙巳,唐改元光启元年”一句,是目前所见唯一关于贞明年号使用时间的记录。贞明九年乙巳,干支纪年无误,是年正是唐僖宗改元后的光启元年(885年)。^[8]据此,他将贞明考订为877—885年,共九年,世隆即位当年即改元,其推论不免有些缺乏论证。

实际上,梁先生所引用的“贞明九年乙巳,唐改元光启元年”一句,是尤中先生校订句:“贞明九年乙巳,唐改元光启元年,二月初八日,遣杨奇肱迎公主还”的前半句。依先生注解可知,原句是:“九年乙巳,改元天启元年,二月初八日,遣杨奇肱送公主还。”^[9]其中的“送”也被尤先生改为“迎”。

从语境看该史料应是先表时间,再叙事。“遣杨奇肱(迎)送公主还”一事若存在,在将其和前句“九年乙巳,改元天启元年”订正后,可以干支相对,方可考出有关年号的起用时间,这才是依据该史料订正“贞明”年号的思路。即先考证事件,再对校时间。

隆舜请婚于唐,唐欲下嫁安化公主一事,最原

^①依中原王朝的改元传统,新君继立一般次年才改元。但南诏年号却有继位当年就改元的做法,南诏拥有年号的9位统治者,其中,异牟寻、寻阁劝、劝龙晟、劝利晟、隆舜、舜化六位均是继位当年就改元。应该说,继位即改元在南诏不是特殊现象,这可能是南诏学习中原王朝建元不彻底的缘故,即没有理解或者说意识到依中原传统,新君继位次年才改元。总之,对此客观存在的问题目前缺乏强有力的论据予以解释。

始的记载来自《新唐书·南蛮传》。其中载：“法遣宰相赵隆眉、杨奇混、段义宗朝行在，迎公主……中和元年，复遣使者来迎主，献珍怪氍毹百床，帝以方议公主车服为解。后二年，又遣布燮杨奇肱来迎……未行，而黄巢平，帝东还，乃归其使。”^[4]6292-6293

这里提到三次“迎”公主，第一次“迎”时间不明。对校其他史料，《资治通鉴》载僖宗乾符五年（878年），“南诏遣其酋望赵宗政来请和亲，无表。”^[2]8204 此外《滇云历年传》也载：“五年（公元878年）四月，隆舜请和无表。”^[10]则隆舜请婚当在878年。因此，南诏第一次来“迎”公主的时间一定在878年“请婚”到中和元年（881年）第二次来“迎”之间。

但问题在于，无论是878—881年中哪一年第一次来迎公主，还是第二次中和元年（881年）和第三次中和三年（883年）来迎。以干支相对，878—883年中的任何一年都不是乙巳年，即唐光启元年。也就是说，尤先生点校后的句子，“贞明九年乙巳，唐改元光启元年。二月初八日，遣杨奇肱迎公主还”一句自相矛盾。

事实上，“送”公主一事确有。据《滇云历年传》载：“中和元年（881年）八月，隆舜遣使朝行在，上表款附。三年（883年）七月，隆舜遣杨奇肱迎公主。十月，以宗女为安化长公主，妻隆舜。光启元年（885年），昆仑国进美女于隆舜，受之。隆舜遣杨奇肱送公主归唐。”^[10]152-153 该史料和《新唐书》一样时间无差的记载了后两次“迎”公主，同时也记载安化公主的确是“妻”了隆舜。

然而“受美女”与“遣归”公主是否有联系，倪蜕亦感到困惑，他按语说：“此岂欲反而归唐乎……皆不可得而考矣。”^[10]153 但无论如何，遣归公主一事实有。《新唐书·南蛮传》所记亦不为失实，黄巢之乱于884年平定，送归公主在885年，诸事发生在一年之间。《新唐书》修史者应不知安化公主短期到过南诏，因此记载缺漏。而由于不同的撰述者记述角度和侧重点不同，此事被《夔古通纪》和《滇云历年传》记了下来。尤先生应是资料受限，只见《新唐书》的记载，因其中只有“迎”公主的记录，并且都有杨奇肱。因此认为是作者故意将“迎”附会为“送”，实乃一大误会。

事实上，安化公主确实被“迎”到南诏，这才有后来又由杨奇肱送归之举。

总之，“送”公主不能改为“迎”公主，否则，校订后的“贞明九年乙巳，唐改元光启元年……遣杨奇肱迎公主还”一句，将会前后时序矛盾、不合史实。

再校“九年乙巳，改元天启元年”一句。“天启”是南诏劝丰祐的年号无疑，但劝丰祐时期与请婚安化公主一事相去二三十年，更何况天启元年是庚申年，因此该句中的天启一定是讹写。上文已确定“送”公主是在唐光启元年（885年），唐在中和五年（885年）时改元光启元年，中和没有九年。因此，“九年乙巳”说的只能是南诏年号的“九年乙巳”。对校其他史料，《夔古通纪》中有：“隆，唐僖宗乾符四年即位，改元贞明”的记载。”^[9]81 唐乾符四年到光启元年（877—885年）隔九年，正对应南诏“九年乙巳”一句元年到九年。而“贞明”是隆舜的第一个年号，因此唐乾符四年到光启元年对应南诏贞明元年到九年，“贞明”是即位就改元。再加上光启元年（贞明九年）干支为乙巳年，所以“九年乙巳”说的是“贞明九年乙巳”，“天启元年”必定是“光启元年”的误写。

综上，这则史料正确的校订是：“（南诏）贞明九年乙巳，唐改元光启元年。二月初八日，遣杨奇肱送公主还。”至于尤先生为何校对前句，改错后句。应是资料受限，属情理之中，将这一件表时序的事当成两句话分开校了。尤先生在注解中也说，他是先根据《南诏野史》中隆舜于唐僖宗乾符四年丁酉即位，改元贞明的记载来对校的。^[9]87-88 这里涉及一个史料理解的问题，《南诏野史》中载：“蒙隆舜，世隆子，唐僖宗乾符四年立……改元真（贞）明。”^[11]在此句句意理解上，尤先生应是将即位与改元理解成当年同时发生的事，真实情况也是如此。然而这则史料也可以理解成乾符四年即位后改元，未必就是当年改元。

事实上，依中原传统，新君继立改元多在次年。如唐人马总所撰《通纪》卷十一载：“太宗崩，即位，改元永徽。”这里说的是唐太宗之后高宗即位改元一事，乍一看似乎可以理解成即位当年就改元，实际上唐高宗公元649年就已经即位，但

次年（650 年）才改元为永徽元年。

可见《南诏野史》中该史料也存在辨析究竟是当年还是次年改元的问题，仅凭该史料不能确证隆舜是即位当年改元。尤先生应是直接将其理解成即位当年就改元来处理的，但他没有提及也没有排除为什么不是次年改元这种情况。由此不难看出，同一则史料之理解并非一种固定线索，在多种可能的情况下，考证者还需更有力的证据审辩。

总之，依《南诏野史》中的记载，《夔古通纪》中“贞明九年乙巳，唐改元光启元年”一句被尤先生校对了，但那仍是一则自相矛盾的史料。而梁先生又据此考订出“贞明”起始年，则属事有凑巧。

通过校订，隆舜即位当年就改元，贞明元年是 877 年，贞明至少使用 9 年，止于何年无从可考。贞明九年（885 年）离嵯耶元年（889 年）只隔 3 年时间，梁先生认为从史料看，南诏与唐的年号有对应之处，因此判断贞明使用了 9 年，且将承智、大同两个年号，与唐朝光启二、三年（887 年）和文德元年（888 年）对应。^[8]其说有一定道理，从史料看，贞明的确有可能只使用了 9 年，史载：

“二年（886 年），地震，龙首，龙尾二关及三阳城俱崩。”^{[10]153}即南诏在 886 年发生破坏力巨大的地震，依改元的传统以及诉求看，逢“大变故”改元符合常理，贞明九年（886 年）极有可能出现改元，即将“贞明”改“承智”。

以上分析也可推知，“承智”和“大同”两个年号也是存在的。其一，《滇史》中记四个年号，“嵯耶”只差一年，必有所本，可信度较高。其次，《新唐书》所记除了“嵯耶”以外三个年号，但“嵯耶”已被考订。世隆起公开称帝建元，唐廷不知隆舜年号的可能性很小。而失载“嵯耶”，则应是改元过频的缘故。如以上所考贞明为 877—885 年，至少明确使用九年来算，嵯耶已知是 889—897 年。则“贞明”改“承智”，“承智”改“大同”，“大同”改“嵯耶”这个过程，是在 885—889 年短短三四年间进行的。《新唐书》失载“嵯耶”，应和隆舜改元太频有关。

至于承智、大同三年之间各用多久，只能期待往后新资料的补正了。南诏历代统治者年号资料如表 1 所示。

表 1 南诏年号对照

统治者	王号/谥号	年号	纪年数	起止年代	
				公元年	唐朝纪年
细奴逻	奇王			653—674	永徽四年—上元元年
逻盛	兴宗王			675—712	上元二年—先天元年
盛逻皮	威成王			713—728	开元元年—开元十六年
皮逻阁				729—737	开元十七年—二十五年
蒙归义	云南王			738—748	开元廿六年—天宝七年
				749—751	天宝八年—天宝十年
阁罗凤	神武王	赞普钟	17	752—768	天宝十一年—大历三年
		长寿	11	769—779	大历四年—大历十四年
		见龙	5	779—783	大历十四年—建中四年
异牟寻	孝恒王	上元	10	784—793	兴元元年—贞元九年
		元封	15	794—808	贞元十年—元和三年
寻阁劝	孝惠王	应道	2	808—809	元和三年—元和四年
劝龙晟	幽王	龙兴	8	809—816	元和四年—元和十一年
劝利晟	靖王	全义	4	816—819	元和十一年—十四年
		大丰	4	820—823	元和十五年—长庆三年
劝丰佑	昭成皇帝	保和	16	824—839	长庆四年—开成四年
		天启	20	840—859	开成五年—大中十一年

续表 1

统治者	王号/谥号	年号	纪年数	起止年代	
				公元年	唐朝纪年
世隆	景庄皇帝	建极	18	860—877	咸通元年—乾符四年
		贞明	9	877—885	乾符四年—光启元年
隆舜	宣武皇帝	承智	3	886—889	光启二年—文德元年
		大同			
		嵯耶	9	889—897	龙纪元年—乾宁四年
舜化	孝哀皇帝	中兴	6	897—902	乾宁四年—天复二年

注：该表内容参考梁晓强先生《南诏史》一书《南诏历代帝王纪年表》，详见梁晓强著《南诏史》^[12]。

三、关于唐宋时期南诏年号的失载

贞元九年（793 年），异牟寻遣使者出使唐朝。贞元十年（794 年）正月，异牟寻与唐朝崔佐时使团在点苍山会盟，点苍山会盟对南诏与唐均有深远影响，双方结束了自天宝战争后将近四十余年的对峙局面。

会盟之外，唐朝还向南诏颁布了中原历法，以示“奉唐正朔”。会盟的誓文中就有“贞元十年岁次甲戌，正月乙亥朔，越五日己卯”的记载，^{[3]261}说明至少在官方交往中，南诏已经开始使用唐历。同时，袁滋册封异牟寻为南诏王时说：“宣敕书读册文迄，相者引南诏蒙异牟寻离位授册，次受贞元十年历日。”^{[3]251}这里更是说得清清楚楚，唐朝向南诏颁赐了自己的历法。此外又有记载说南诏“清平官尹辅酋来朝……异牟寻上表陈谢，册命及颁赐正朔。”^[13]也提到唐对南诏颁赐历法，“奉唐正朔”。

从异牟寻中期到世隆即位前的数十年间，唐诏关系一直处于比较稳定的状态。贞元会盟后，南诏重新奉唐。唐朝还向南诏颁布了历法，在南诏广为传播，其中干支法影响深远。尽管南诏对内使用自建年号，但在与唐的官方交往中，往往使用唐历。

从文献学角度看，有关南诏年号的史籍资料，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中原记述，主要是元朝以前的《旧唐书》《新唐书》和唐人撰的《蛮书》。另外就是元朝以后的云南本地著述，其编撰者多为滇人或有关滇经历者，其中，以《爨古通纪》和《云南志略》最早。大部分南诏年号，均载于元以后的云南本地著述，而少见于元之前的中原记载。

何也？这是一个十分值得思考的问题。

南诏的年号从阁罗凤“长寿”直到劝丰祐“天启”，在现今可见元朝以前的中原典籍中皆失载。笔者通检《蛮书》《旧唐书》《新唐书》和《资治通鉴》，发现其有关南诏年号的记载，《蛮书》和《旧唐书》仅有“赞普钟”一个。《旧唐书》有关南诏之史料不为多，已为世人所知。《通鉴》与《新唐书》关于南诏年号的记载词句几乎约同，不无借鉴之嫌。《新唐书》中对南诏年号的记载则更令人疑惑，其中，首先记载了“赞普钟”，但从“赞普钟”之后直到世隆“建极”之前的 10 个年号（从长寿直到天启）全部失载。从“建极”开始，之后除“嵯耶”以外，又全部连顺序都不变地记了下来。

南诏在“赞普钟”以后已长期自建年号是无疑的，即便不提后人已考订出的结果，这一时期的考古实物也可直接证明此事。如昆明西寺塔有铭文塔砖载：“天启十年正月廿五日段义造砖处题书。”剑川石钟山石窟中有刻铭载：“国王天启十一年七月廿五日题记。”《南诏图传·文字卷》载：“全义四年己亥岁”和“保和二年乙巳岁”。^[14]“全义”“保和”“天启”均是“赞普钟”到“建极”之间的年号。

《蛮书》所记，依常理，樊绰跟随安南经略使蔡袭的时间在唐咸通三至四年（862—863 年），等于世隆建极三四年。樊绰为当事人，且撰书时曾参考包括袁滋《云南记》等资料，不对南诏年号记载疏漏如此，何解？

贞元会盟以后世隆以前，唐朝依制要对南诏领主册封、祭悼。《新唐书》对此记载颇详，“元和

三年，异牟寻死，诏太常卿武少仪持节吊祭。子寻阁劝立……改赐元和印章。明年死，子劝龙晟立……十一年，为弄栋节度王嵯巛所杀，立其弟劝利。诏少府少监李铢为册立吊祭使……长庆三年，始赐印。是岁死，弟丰祐立……穆宗使京兆少尹韦审规持节临册，丰祐遣洪成酋、赵龙些、杨定奇入谢天子。”^{[4]6281}官方交往频率颇高，对南诏情况应知晓更多才对，为何出现反而失载的情况？

新、旧《唐书》和《蛮书》的记载，恰好表明由于南诏对外“奉唐正朔”，在官方交往中的确是使用唐历。因此唐朝在世隆以前，不知南诏自建年号一事。从世隆起公开称帝建元，后世修史时，《新唐书》才得以将之后的年号记载下来。《新唐书》的记载亦可间接说明，不但唐朝不知世隆以前曾长期自建年号，就是到北宋欧阳修等人修史时，也未必知晓此事。

此外新旧《唐书》和《蛮书》都记载了“赞普钟”，是南诏将其刻在《德化碑》上的缘故，而《德化碑》本就是南诏亲唐的一大物证。至于樊绰为唐咸通（南诏建极）时人，为何只记下“赞普钟”？首先，撰书的目的乃是为战争服务；其次，樊绰毕竟随蔡袭到西南时间不长（蔡袭862年上任安南经略使到863年战死，前后就一年）。樊绰应不知之前的年号，对于后来年号，私家撰书，时人不可知后来情况。今天所见这段失载的年号史料，多是成书于元朝以后的云南本地著述，尤以更原始的《樊古通纪》为主。其中自有一条云南区域文献史承袭的脉络，这些年号史料因此被流传下来。除了前述自建年号的碑刻证据外，两类时间不同，撰述主体不同的年号史料对比更加说明，唐人不知世隆以前南诏自建年号一事。

事实上从寻阁劝开始，南诏历代统治者均自称“骠信”，“骠信，夷语君也。”^{[4]6281}即“骠信”就是汉语君，皇帝之意。同时我们从年号表中也可看出，南诏的自建年号，无论是“见龙”“应道”，还是“保和”“中兴”，都具有明显“临摹”中原的意味，其中多寄托国家复兴、图腾保佑、真龙天子皇权神授等寓意。

综上所述，隆舜是即位当年就改元，贞明元年是877年。同时，对于南诏年号从“长寿”到“天启”在元以前中原典籍中的失载，则是南诏对内自建年号一事长期不为唐知的结果。其历史背景是贞元会盟后南诏重新奉唐，在历法使用上需“奉唐正朔”，保有臣属意义。因此，南诏民间使用和唐朝一致的干支计时法，与唐交往时亦使用唐朝年号纪年，而对内则使用自建年号纪年。南诏年号的蹊跷失载恰能说明南诏与唐交往中，“奉唐正朔”的属国性质，也表现出南诏统治者对外奉唐，对内则自统一方的矛盾心态。

[参考文献]

- [1] 杜佑. 通典·边防三 [M]. 王文锦,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92: 5067.
- [2] 司马光. 资治通鉴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6.
- [3] 向达. 蛮书校注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 [4] 欧阳修. 新唐书·南蛮传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 [5] 董诰. 全唐文: 卷624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6301.
- [6] 汪宁生. 云南考古 [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0: 182.
- [7] 诸葛元声. 滇史 [M]. 刘亚朝, 点校. 德宏: 德宏民族出版社, 1994: 200-204.
- [8] 梁晓强. 南诏后期纪年订正 [J]. 曲靖师范学院学报, 2007 (5): 55-57.
- [9] 佚名. 樊古通纪浅述校注 [M]. 尤中, 校订.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8.
- [10] 倪蜕. 滇云历年传 [M]. 李埏, 点校.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1992.
- [11] 胡蔚. 南诏野史 [M]. 木芹, 会证.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0: 165.
- [12] 梁晓强. 南诏史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653.
- [13] 王钦若. 册府元龟: 卷653 [M].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06: 7535.
- [14] 梁银. 云南发现的南诏纪年文物及其相关问题研究 [J]. 大理民族文化研究论丛, 2012: 133-141.